

我的拾荒術--整編澳洲華裔政治史檔案的心得與述評

郭美芬 Mei-fen Kuo

即使這些私人的文件沒有遺失，沒有被老鼠吃了，沒有被當成古董賣掉，或在搬家遷移中被丟棄，當前的擁有者也沒有義務要拿給你看。我舉這個例子是為了說明，文件與檔案匱乏與受限的情況，最典型的原因是因為沒有歷史興致使然。

-- Marc Bloch¹

Marc Bloch 在《史家的技藝》一書中談論到，除了社會環境對於檔案保存有相當的共識並建立一套規則外，史料檔案的出土多少都含有偶然與機緣的因素。他更指出了史料再現的重要關鍵是持有者的歷史興致使然，然而，對於如何促進民間的歷史興致，Bloch 沒有進一步多談，但他指出每個時代的研究者都各有其獨特的工具，在受限的檔案中得以尋覓各種蛛絲馬跡。²

我在台灣的大學所受到的歷史學訓練，主要在於如何增進歷史學知識的正當性以及與其他學科對話和合作，如何在圖書館、檔案館以及博物館等知識殿堂中尋覓自己的問題和答案。對於剛剛入門的我來說，歷史學是一門在無窮無邊的浩瀚檔案史料堆中，重新詮釋當下與過去的技藝。當時對於 Bloch 所說的，社會對歷史的興致和風氣會影響到檔案的出土跟保存，我並沒有很大的感想。一直到在澳洲攻讀博士的期間，我才發現，歷史學這門學科更牽涉到史家如何面對那些隱匿的檔案與史料，就像人類學者與社會學者一樣，史家的工作也必須深入他們研究的民間社會，而這項技藝有別於在學院以及檔案館研究史料的技藝，在這探索與訓練過程中，我獲益良多。

本文記述我從 2006 年起協助整編澳洲雪梨及墨爾本兩地華裔政治歷史檔案的經過及個人心得，我將之戲稱為「拾荒術」，以別於學術界的訓練。從尋覓檔案到得以進入雜亂無章的儲藏室中，整編這一批檔案的旅程遠比我所想像的還要漫長，也絕非一己之力就能完成。同時，我也逐漸發現這批史料所蘊含的學術價值，也遠遠超過政治外交檔案的範圍。

整編雪梨國民黨史料的經過與心得

關於我的拾荒術的訓練旅程，一開始起因於我的博士班指導教授 John Fitzgerald 協助陳民熙(Henry Chan)老師聲請國家圖書館年度的「地區文史獎助金」(Community Heritage Grant)，以整理位於雪梨「中國國民黨駐澳洲總支部」的史料工作。因為雪梨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

¹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of Manchester, 1954), p. 73.

² Bloch, *Historian's Craft*, pp. 75-78.

我的拾荒術

司徒惠初先生數十年來保存此批史料的努力，以及希望推廣其歷史的用心，促成了這一批史料檔案的首次對外開放，也讓我有幸接觸這一批史料。

2006 年初開始，在雪梨炎夏的氣候中，我著手整理存放於位於唐人街鬧市中總支部三樓中的史料。根據司徒先生的口述，他在 1990 年代晚期開始著手將史料開封整理，但部分史料由於存放在頂樓時期受到損壞，在過於陳舊腐壞的情況下不得不丟棄。而存留下來的史料，則分別在司徒先生的安排下被展示於三個房間中。首先，整編這批檔案最大的難題在於史料的年代、素材及內容範圍十分豐富，對於剛開始研究澳洲華裔歷史的我來講，十分具有挑戰性。而陳民熙教授也教導了我非常寶貴的功課：盡量保存史料檔案在司徒先生整理下的樣貌，因為那也呈現了司徒先生從他的眼光中如何挑選史料，以及澳洲國民黨如何呈現他們的歷史。

此外，我更開始著手建立中英文的目錄，並針對每一檔案的重要性及保存的情形加以判斷。在我整編史料的兩三個月過程中，陳老師每週都遠從藍山過來市區，已經八十餘歲的司徒先生更是幾乎每兩三天就來看看我的工作情況。經過整編後的文件，不包括歷史文物及照片，共有 476 份檔案與卷宗，卷宗收藏年份從 1915 年起至 1960 年代。檔案內容多為總支部對外書信、各支部及私人來函、大洋洲各地會員名冊、財政報告、開會紀錄、剪報書籍、出版刊物及捐款名單等。這批檔案的年代多半集中在 1920 至 1940 年代，也說明了雪梨國民黨在這一段時期的盛況，而檔案內容方面，則以會費以及書信往來為主，請參見下表的簡單說明：

檔案年代統計 (以較重要的檔案為主) 檔案分類

年代	數量	百分比	類別	數量	百分比
1910s	13	3.16	捐款及會費收入明細	88	26.27
1920s	99	24.09	公文及私人書信	77	22.99
1930s	63	15.33	財務檔案	38	11.34
1940s	113	27.49	各界委員會選舉檔案	33	9.85
1950s	45	10.95	會員名冊	28	8.35
1960s	9	2.19	各式證書	26	7.76
1970s	3	0.73	會議記錄	23	6.87
1980s	34	8.27	各式收據	22	6.57
1990s	28	6.82			
2000s	4	0.97			

我在整理這批史料時，最大的震撼是在於一開始我僅僅將國民黨視為政治團體，但事實上，二十世紀前半葉在白澳政策以及中國政權的更迭影響下，國民黨的黨所也提供了當時

華裔社群聚集的公共空間，並舉辦了舞會、餐會、播放電影等各項活動。而在二次大戰期間，國民黨黨所更成爲支持中國抗日的中心，同時也提供了文教功能，包括出版報紙，以及開辦中文學校等。二次戰後，以及澳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邦交後，國民黨依舊是東南亞以及台灣移民的重要僑團組織之一。也就是說，潛藏於政治稱號底下，國民黨的文件與史料其實更具有社會與文化的研究價值；同時，這一批史料不僅記錄了雪梨華裔社群的活動軌跡，作爲總支部，其文件更保留了來自澳洲各地分支以及當地華裔社群的資料。

這批檔案不僅是研究二十世紀澳洲及太平洋群島地區華裔社群參與國民黨的第一手史料，更是理解澳洲華裔社群社會及文化生活的檔案。這一批檔案從 1915 年起直到 1980 年代，見證了從二十世紀初開始雪梨的國民黨如何成爲南太平洋華裔團體的中樞。1915 年，這一個政治團體以「國民閱報書社」的名義在雪梨成立，當時由於孫中山爲首的中華革命黨與中國袁世凱政府政治立場相左，使得雪梨支持共和革命的華裔人士僅能以「國民社」爲名集聚，以免加深與袁世凱政府指派的駐澳洲中國領事曾宗鑑間的衝突。根據司徒惠初先生記述，一開始「國民閱報書社」是租賃位於 43 Smith Street, Surry Hills 的地下室爲辦公及聚會處所，爲了響應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並不時捐款充作軍餉，直接匯往東京，檔案中更有匯款東京的收據，以及當時爲中華革命黨財政部副部長廖仲凱的收據回條，以及孫中山親筆回文感謝雪梨華裔人士捐款的真跡。後來又租賃了位於 211 Thomas Street Haymarket 的一處店面作爲活動的機關，此時已經轉向公開活動，組織也漸趨嚴密及具規模。1916 年 6 月 20 日，支部舉行盛大的正式成立大會，並改選職員，選出郭標爲部長，並決定向各地發展組織以振興業務，及至各地黨部的組織日趨發達，各黨部每週皆舉辦一次演講會，而雪梨支部的聚所，每晚通常有數十同志前來看書閱報。當時華裔志願加入者爲數日眾，於是雪梨支部乃倡議籌備懇親大會，以資聯繫。

1921 年之後雪梨國民黨遷移至目前的黨所，所有的文件與檔案也都存放在此棟建築物中，但隨著辦公室與黨所功能的擴充，歷史文物也在此棟建築物中經過幾次的搬遷，部分歷史文物檔案也在這段期間遭到丟棄。所幸過去在司徒惠初先生的提議下，部分歷史文物與檔案得以被保存，並陳列在四樓的房間中。根據司徒先生的回憶及口述得知，這批史料因爲搬運以及過去堆積在紙箱中，加上過去曾經發生過淹水以及雪梨夏天炎熱氣候的影響下，許多史料都出現受潮毀損以及陳年灰塵的破壞。1990 年代後期，隨著當時承租國民黨爲上課處所的育梅中文學校遷移後，當時司徒先生與黨部決定將黨所的史料文件整理擺設出來，供大眾瞭解其黨部的發展。

這批史料的開放與整編，對於研究澳洲華裔社群的內部聲音，提供了相當重要的資料。而截至目前爲止，依舊鮮少有華裔社群組織對外開放如此龐大而珍貴的收藏。此批史料收藏了二十世紀前半葉國民黨在澳洲以及南太平洋上三十五個分支的紀錄，內容涵蓋了華裔社群對於公共議題包括性別、經濟投資、社會網絡、慈善募款、政治取向等相關活動與討論，

展現了此批史料所涵蓋的多元面向，是以此批史料可被視為不僅是研究澳洲華裔內部社群的重要資料，更是相當獨特的公共歷史資產，也成為未來重新詮釋澳洲歷史的重要檔案之一。此外，此批史料更可能是在中國及台灣之外，關於國民黨組織的最大宗文件，因此也可以說此批史料具有提供研究海外國民黨組織的研究價值。

整編墨爾本黨部史料過程

在整編雪梨國民黨史料時，有一天我無意發現閣樓尚存放著十箱未開封的檔案，陳民熙博士事後向我透露，當時他非常希望學界尋覓很久的領事館檔案會在其中，但我們開封後發現那些檔案依舊是屬於雪梨國民黨的黨部文物。事實上，關於中華民國駐澳洲領事館的檔案僅在楊進發於 1975 年出版的著作中（是否加註？）被引用過，但卻無人知道其下落。我也試著在台灣的外交部檔案中尋覓這一批文件的可能蹤跡，但是都沒有什麼收穫。

在司徒先生的引薦下，2007 年我拜訪了墨爾本國民黨黨部，與雪梨國民黨的發展相似，在 1921 年墨爾本國民黨黨員也集資在墨爾本唐人街中心地帶購置了三層樓的黨所。當時我拜訪了墨爾本黨部的劉新耀先生，他不僅慷慨地將黨部的重要幾本著作借予我閱讀外，更在某次機緣下，開放頂樓讓我一窺黨所的內部樣貌。而在這一次的拜訪中，我在墨爾本黨部古董級的書櫃裡發現了中華民國駐澳大利亞領事館檔案，這批檔案在那裡已經原封不動保存了至少半世紀以上。

這一批領事館的文書資料結合墨爾本國民黨本身的史料，約有 230 項，大約有超過 3 萬筆文件，數量上雖沒有雪梨國民黨的史料來得多，但是其完整性與一手史料的重要性，卻是難以估計。「駐澳大利亞中國領事館檔案」共有 164 份卷宗，約有三萬筆文件。這部分的檔案有百分之七十為原始手稿，其他則為公文以及書信副本。此檔案分別出於 15 位總領事、代理領事和領事，歷經清朝、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以及遷台時期。

此批檔案因為墨爾本黨所於 2007 年到 2008 年底整修的關係，禁止對外開放。2009 年起，我在獲得澳洲政府的研究補助下重新回到墨爾本，在與前聯邦參議員陳之彬先生聯繫下，再度接觸到這一批史料。同年，陳之彬先生更向澳洲國家圖書館提出聲請，獲得「地方文史」補助，在他的支持下，墨爾本黨部的此批史料也首次被整編，希望未來能夠向公眾與學界開放。

領事館的檔案大致上可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 1908 年起至 1929 年，當時的駐澳大利亞中國總領事與中國官方、澳洲政府和澳洲華裔間的來往文書。清廷於 1908 年任命第一任駐澳洲的領事，第一任領事於 1909 年抵達墨爾本，直至 1929 年 10 月，中國駐澳洲的領事館才從墨爾本遷移至雪梨。領事館遷移至雪梨時，原位於 William Street 的領事館物品也在當時變賣，當時總領事宋發祥呈報中央，墨爾本華人希望由華人出任榮譽領事，在墨

爾本繼續領務工作，然而中國官方並未同意，年底由李鴻(Hong Li, aka Lee Hong)擔任副領事，承辦墨爾本領務。因此由 1929 年 10 月至年底，墨爾本領事館並無辦公處所也無人管理，形同虛設，領館的檔案在無人管理與存放的情況下，被移送到國民黨黨部。

檔案年代從 1908 年到 1929 年，初步的估計約有兩百多件一手的歷史檔案，約兩萬張左右的文件書信。包含領事館與中國跟澳洲官方公文書信來往，及澳洲華人社會聲請簽證護照及各項陳情。至於檔案的保存狀況，主要取決於當時領事館的文書處理方式，關於與中澳兩國官方的公文書信來往，皆有文件夾或是木盒保護，信件並依照中英文方式編號裝訂成冊。以文件夾保護的文件，一為線繩穿孔裝訂成冊，另一為金屬夾針的裝冊方式，但部分已經受損。記載來往書信的羊皮書則久未清潔，部分有受損狀況，內頁部分也因為受潮關係，筆墨字跡難辨。而被歸類為一般來信的檔案，雖也以中英文方式編排，但是多為散落不齊，佈滿污穢皺摺以及蟲蛀受潮現象，狀況不比公文書信檔案來得整齊，保護措施也不那麼周全。

第二部分的文書規模小於第一部分，是在總領事館遷移至雪梨及坎培拉後，墨爾本領事館於 1930 至 1957 年期間的文書檔案。1929 年起，墨爾本未有正式的領事館辦公室，而從 1932 年到 1939 年間，墨爾本國民黨以及僑團包括中華公會、四邑會館等傾力捐款補助領事的支出。直至 1939 年，曹文彥副領事由雪梨調任到墨爾本成立正式的領事館，負責籌辦領務。1949 年後隨著墨爾本領事館遷移到新的辦事處所後，國民黨不再協助保存領事館的文書檔案，1950 年代僅有關於台灣戰俘的檔案文件存放在國民黨黨部。總括而言，1930 年代至 1950 年代的領事館檔案共有 63 份卷宗，部分檔案的年代不明確，檔案保存狀況皆為以金屬夾針裝訂方式，許多文件散落，也缺乏有系統的整理。

以書寫文字和涵蓋的年代為例，整批領事館的檔案可分類如下：

檔案書寫語言

語言	數量	百分比
中文	86	52.5
英文	32	19.5
中英文並列	46	27
總數	164	100

檔案年代統計

年代	數量	百分比
1900s	10	6
1910s	57	34.7
1920s	44	26.7
1930s	30	18
1940s	22	14
1950s	1	0.6
總數	164	100

此外，此批檔案尚包括國民黨黨部於 1920 年代至 1950 年代少數保留下來的史料，此批檔案的數量與價值雖然不比領事館的史料，但是初步清查的狀況發現，這部分史料的價值有

我的拾荒術

兩部分：

- a. 國民黨清黨之後對 1920 年代後期墨爾本黨部組織的影響
- b. 國民黨黨部在缺乏領事館的期間，其對華裔社群的影響

此檔案收藏於中國國民黨美利濱分部，共有 56 份的一手檔案，及 114 份印刷品，檔案規模較小，多為 1930-1960 年代間美利濱分部及維多利亞支部會員名冊、開會紀錄、書信記錄以及各式收據。印刷品收藏較重要的有數十本五四運動時期出版的報刊《進步雜誌》；此外，多為外交部、僑委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教育部、新聞局等發行的印刷品。

而這一批領事館的檔案文書以及墨爾本少數的文件，具有相當重要的研究價值，這一批檔案可以說首次完整提供了當時中國外交代表在地方華裔社群以及澳洲官方間所扮演的角色與聲音，同時也是理解華裔社群內部變遷的重要寶庫。

澳洲歷史學家 Paul Jones 在整編澳洲國家檔案局中有關中華民國領事館的檔案時，發現國家檔案局的資料多為 1930 年代之後的領事館文書，因此，此批史料中大量中國領事館與澳洲官方的往來文書，將可彌補此一檔案的斷裂。同時，收藏於台灣的中華民國外交檔案也集中在 1930 年代之後，主要原因是 1908 年到 1928 年間中國政治局勢混亂，南北政府交戰下，許多檔案都已經散失。是以，這批收藏於墨爾本國民黨黨部的 1908 年到 1929 年間的領事館檔案，將可能是目前唯一較為完整的中華民國駐澳大利亞領事館檔案。檔案中包括了澳洲各州華裔社群與領事館的書信往來、各式簽證聲請、與澳洲政府的公文、中國官方各式宣傳與訓令等等，顯示了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外交代表對於華裔社群和澳洲政治社會的態度與對應，也使得此批史料成為訴說華裔社群歷史相當珍貴而難得的重要一手史料。

小結

從 2004 年開始，在許多人的協助下，雪梨與墨爾本兩地的國民黨逐漸開放其檔案文件，這是極大的幸運。尋覓與開封這一批史料檔案的過程，遠比我想像的來得漫長，卻也讓我獲益良多。當古董的書櫃被打開後，繁雜且佈滿灰塵的史料，要如何被琢磨成為可供閱覽的歷史敘事？這一段過程，是眾人通力合作而成，澳洲雪梨及墨爾本兩地國民黨耆老與中生代成員們固守其組織與歷史的堅持，歷史學者——例如已經過世的陳民熙老師——對於這段歷史的熱情，澳洲國家圖書館及地方政府對於文史遺產的經費補助，都是缺一不可。

然而對於歷史研究者來說，靠近與解讀這些檔案，卻也是極大的挑戰。2007 年我的博士指導教授費約翰（John Fitzgerald）出版了 *Big White Lie: Chinese Australians in White Australia*，成為研究澳洲華裔歷史的重要著作，本書更從國家檔案、官方文書、個人書信或是口述歷史等不同方式翻轉澳洲華裔在澳洲歷史上的位置與形象，更提出澳洲華裔與澳

洲其他族裔一樣認同近代普世的價值，諸如民主、自由、公平等，進而強調澳洲華裔在澳洲現代化及全球化進程上的貢獻。另外，學者 Marilyn Lake 與 Henry Reynolds 在 2008 年出版的 *Drawing the Global Colour Line: White Men's Count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Racial Equality*，也同樣提出在澳洲的現代化過程中，華裔與其他移民社群對於將澳洲帶向全球化的歷史貢獻。

然而，如同許多移民故事背後不為人知的辛酸，這一批史料其實更訴說了在澳洲現代化與全球化過程中，華裔社群如何面對自身的命運、社會變遷、文化衝突及政治意識型的挑戰。這一批檔案向我們訴說了二十世紀前半葉，中國的政治代表，像是外交領事或是國民黨組織，在嚴峻的白澳政策，在故國的政治與戰爭激盪下，他們彼此緊緊伴隨並記錄了澳洲華裔社群在巨變年代裡的集體故事，然而這段故事，尚需要開封更多的史料，也需要更大的耐心、更完善的工具去琢磨，不然將僅是一段歷史的漣漪。

透過這一段「拾荒術」的介紹，我希望揭露這批史料的出土，說明了類似的華裔故事與檔案一直都存在澳洲各地，就像許多目前澳洲華裔歷史的研究也證明了尚有許多故事等待著被發掘，而除了像布洛克所提出的發現史料的機會關鍵外，在史料整編的過程中，我更學習到這些史料與檔案從被隱匿、保存、整編到對外開放，是一漫長的整合與協商過程。2009 年開始在司徒惠初和陳之彬先生的支持和協調下，兩個黨部更首度與 La Trobe University 合作，共同向澳洲研究委員會提出研究計畫的聲請，並終於在 2010 年中獲得澳洲研究委員會的支持。

而 2009 年我更代表大學以及黨部向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尋求關於數位化政治與外交檔案的協助和諮詢，2010 年 10 月黃克武所長及張力副所長在 La Trobe 大學的邀請下，聯袂前來澳洲參訪這批檔案，兩位學者更肯定此批檔案對於研究海外華裔歷史的重要性。近代史研究所和檔案館不僅收藏了清末至中華民國時期的重要政治外交軍事和經濟檔案，更在近年來致力於數位化歷史檔案。在近代史研究所的支持下，此批檔案也將於 2011 年開始數位化的工作，未來待這批檔案數位化後，我相信將會成為研究澳洲華裔歷史的重要寶庫之一。

我在這段過程中，也認知到史料與檔案的再現，涉及到許多方面的配合與協商，而開啓這一段記憶與故事的鑰匙，首要是整編史料的基礎工作需要更多人的配合與支持；再者是史料提供者與學界間的協調，如何找到彼此合作的平衡點；最後，政府與大學的支持以及未來建立一個常態性的研究中心，以整合各項澳洲國內以及國際間的資源，方能使更多的故事與檔案被發掘、被紀錄。此外，最後一項心得是我在這段過程中學習到：「歷史」不該是存放在博物館、檔案館或是圖書館中不可褻玩的寶藏，發掘與整編史料的意義也不應該僅是將檔案放進博物館中保護而已，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如何將這批檔案更容

我的拾荒術

易為研究者所應用與認識，因為唯有在更多人的努力下，歷史方能越辯越明，也因此，希望透過這一經驗能讓更多的澳洲華裔個人與團體的史料被重視與公開，唯有史料與資料的公開與應用，才能真正促進我們對歷史的認識以及學術上的進步。

